
晚清民国博物馆理论补述

王运良¹

(河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中西文化在不断碰撞中时时交流融汇，国人逐渐认识到陈列、展览、博物馆的实质内涵与功用所在，并有诸多实践。同时经过中外纵横考察与对比，学者开启了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先河，建构了博物馆学科及专业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对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建设与管理、发展历史等作了见仁见智的研究。这其中除了张謇、蔡元培、陈端志等学者外，尚有诸多人士也为此积极努力，他们各自的建树不仅进一步丰富并见证了博物馆在中国早期发展阶段所取得的理论性成果，更揭示出博物馆建设与社会发展、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内在密切关系。

【关键词】：民国博物馆 博物馆功能 博物馆教育 博物馆建设 博物馆经营管理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博物馆初创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尽管社会动荡不安，但是国人关于博物馆的实践从未停止，相关的理论思考与探索也是墨耕不辍，其中除了张謇、蔡元培的理论思想以及费畊雨、费鸿年、陈端志、曾昭燏、李济、傅振伦等人的著述在今天已得到系统梳理并广为人知之外，尚有诸多人士对其时的中外博物馆相关理论作了深入探讨与积极引介。惜迄今似无较为全面、系统的挖掘与整理，甚至并不为人所熟知，故笔者对此作一尝试，以求多方面呈现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实践进程中的理论建树及其意蕴所在。

历史资料显示，在晚清民国时期，见于各类媒体报端、公务文件，由国人建成开放或筹备建设、纳入计划、提议设立的博物馆，其总数已过百座，诸如通州博物馆、教育博物馆、中国交通博物馆、水工博物馆、乡土博物馆、邮票博物馆、卫生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尤其是当时建成并对外开放者，无不引起国人之广泛关注，观众也络绎不绝，相关的理论探究应运而生，从而为今天留下了诸多宝贵遗产。

二、对于博物馆功能的探析

中国博物馆的功能在其诞生之时并未像西方博物馆一样经历了“搜藏—研究—教育”的逻辑进程，而是基于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直面民族危机，慨然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其践责的路径是充分发挥文化、社会教育功能，提升国民综合素养，促进国民的文化自觉、经济振兴与民族精神复苏。

博物馆搜集、保存并展示历代实物，这些实物呈现着民族的个性、凝聚着民族的精神。曾任河南博物馆馆长的王幼侨最先论述了博物馆与民族复兴的关系，他认为“复兴民族，首要改善民性；改善民性，必明了历代民族种种情形之不同；欲知历代民族

¹作者简介：王运良（1968—），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与博物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博物馆史料整理与研究”（20BK043）阶段性成果

情形之不同，非就历代实物上做以证明不可”¹。由此，博物馆“在人文上可以发挥民族的精神，恢复民族的道德，激励一般的民族意识……博物馆之使命，实与民族复兴有至密切之关系”²。诸多博物馆收藏并传递文物的艺术之美，曾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委员兼艺术考古部主任的历史学家郑师许指出“由美术鉴赏而改变了人生观，因理解人类过去的生活而惹起爱乡的观念，养成爱国的精神，尤其是博物馆对于社会教育的最高功绩”³。博物馆展示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碑学大家、书法家祝嘉认为博物馆是教育的利器，“可以供给不识字的人以知识”“可以唤醒民众，使民众油然而生爱国家爱民族的念头”⁴。文化是城市的内核与灵魂，博物馆建设自然应成为都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曾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历史与博物馆学家杨宽指出，都市文化建设应特别着眼于博物馆建设⁵，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落后使社会教育不能落到实处，所以，在加紧博物馆建设的同时也应做好藏品的搜集、陈列和研究工作，端正民众对博物馆的认识：“博物馆必须做到‘深入浅出’，才能发挥巨大的功能”⁶。图书馆学家、翻译家程伯群认为博物馆对于文化的贡献很大，其地位甚至超过图书馆；博物馆是文明的载体，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发明及事迹，这一点只有到博物馆里才可以做到⁷。广东现代考古事业的开创者胡肇春将现代化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的“大众化”，并要求博物馆“把复杂精密的科学、神秘难明的史前人类、变化万千的动植物生活、至美至善的高深艺术……用最有条理的设计布置、最清晰最引人入胜的说明、最激发人心的暗示、最充足最便利的机会、最周密简易的方法”，使观者“时时刻刻感觉到博物馆为民众的大学、为获取智识的故乡”，所以，现代化博物馆是以此新目的即“要充实一般民众的知识和生活”；新态度即“以智识的公仆自任，设法开展及深植其影响”；新方法即“尽量利用所保藏的物品，使物尽其用”为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⁸。曾任职于上海博物馆与同济大学的考古学者蒋大沂认为博物馆应摒弃私利、专求公利，尽力为公众搜集材料、为公众整理材料、向公众陈列材料⁹。博物馆学家韩寿萱呼吁全社会充分认识现代博物馆的功用，而不能视之为太平时代的点缀物、国家体面的必需品；现代博物馆是最能妥善保存古物的机关，是走出十字街头为大众谋实际幸福者¹⁰。

不同性质、不同专题的博物馆同样能够发挥相应的教育功能。杨宽指出，世界上的博物馆已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为专门化、一为大众化，无论何种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上都发挥较大的效用，因此，英、荷、美等国还设立了“户外博物馆”“路旁博物馆”¹¹。考古及博物馆学家荆三林指出民俗博物馆“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种写照，可以输入文化知识，可以普及教育，又可供一般学术家的参考，甚而可以因人民的生活而改良社会，这种博物馆才是我们中国现在所需要的，而且是最需要的、一种效力最大的博物馆”¹²；并认为通俗的地方博物馆的功用重在进行“完全的一个地方的社会教育”¹³。对于科学博物馆，他认为其“是制造文明的场所”，也是发展地方文化、普及教育的大本营，中国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导致不能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而贫穷落后，所以中国需要建设类似于欧美的科学博物馆，推动民族进步与发展¹⁴。科学家与教育家陈邦杰则直言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的创立对于国家民族十分重要，应在全国推广¹⁵。地理学家胡焕庸探讨了建设边疆博物馆的重要性，指出我国东北诸省、新疆、西藏等已构成边患，应在首都建立一座边疆博物馆，“此与国家政治外交文化经济诸端，均有重大关系，一切开发边疆、充实国力之大业，均将以此为发轫点，其功用固远在一般普通博物馆之上”¹⁶。曾任上海警察博物馆馆长、浙江警官学校教官的警政研究专家阮光铭在主持上海港警察博物馆筹建时指出，警察博物馆是搜集并分类陈列有关警政的各种文物器具、模型图片的一种有意义的机构，既可以为警政学术探讨提供各种资料，也可以为警察自身进修之助，故而“警察博物馆在警界范围内之不可付诸阙如，正如学校在社会的重要性一样”¹⁷。发表于《工业安全》的《安全博物馆的使命》一文认为，“工业灾害的预防、劳工卫生的改善和其他福利设施的进步，以利用博物馆最为重要，且是最有效的方法”，“纽约、米兰、伦敦等都有安全博物馆，并各自通过陈列、演讲、研究、实验等，有效促进了工业安全、增进了工人福利。故，安全博物馆的使命既在于陈列过去、反映进步，更在于展望未来、指导实践，对于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均承担着重要职责”¹⁸。胡肇春也指出，抗战胜利之后需要在全国设置“建设博物馆”，首都设总馆，各地设分馆。各馆均属教育部，负责国家社会教育之大部分责任，“尤以普及民众识字运动，传授民生日用科学知识，养成技术干部，改善日常生活，增进国民健康为首要任务”；还须紧密跟踪国家科学发明，“务求一切新的发明发现迅速传习到民间”¹⁹。孙志良（生平不详）认为小学举办小型博物馆对于增进儿童识别力、促其养成勤勉习惯、节省教师搜集教学标本的时间、免除教学标本再购费用、培育儿童对自然的爱护之心等均有裨益²⁰。

与此同时，国人对博物馆功能的解读并未囿于自身的闭门思考，也积极关注国外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及其研究，并通过翻译引介相关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国人的相关认识。著名教育家杨汝熊的译作《博物馆与学校》指出，博物馆已成为“一种具有逐渐增加的责任和广大的机会之教育机关”，且对博物馆教育效能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博物馆只能对儿童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博物馆是学习之无限可能的地方”，因为其搜藏涉及的思想、宗教、日常生活和态度等方面内容都是学

校极少涉及的。美国自然史博物馆、菲尔德博物馆等博物馆开展的馆校合作成效显著，可谓博物馆发挥教育效能的典型示例²¹。陈至诚（生平不详）翻译的关于日本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文章阐述了地方博物馆网建设的意义与作用，并指出近代博物馆的特征在于有社会教育的机能，需要从上至下建立全国博物馆网，尤其需要在全国乡镇先行建立地方小博物馆网，使民众充分认识到博物馆的教育意义，并激发青年人明了地方、爱护地方、开发地方的责任感²²。这些译作不仅有利于拓展国人对博物馆社会教育功用的认知，更有益于加深时人对博物馆与个人、社会、民族、国家发展关系的体悟，进而为特殊时期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营造有益的社会环境。

三、对于博物馆建设的探讨

博物馆发挥重要的教育作用，自然离不开合适的场地，而场地内的各种设施及其布置也至关重要。

早在1924年，《科学》就有文章指出，太阳光线对陈列品伤害最大，例如西德尼经由试验得出结论，“陈列室不辟窗户，全用电光，利益实多，惟不宜于弧光”；卢卡斯指出，“吾辈博物馆家既不能制造出透明不过化学放线之玻璃，以滤去日光中之破坏原质，自不得不借重电光解决此问题”，所以博物馆建筑必须仰仗人造光源²³。此可谓国内最早对博物馆采光问题的关注。

博物馆建筑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建筑，周盛德（生平不详）对博物馆建筑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认为博物馆建筑的各个部分“皆有异于寻常建筑”，同时也是“最宜聚精会神”之处，因此，其建设首要在于“主持者之得人”，其次在于“主持者和建筑师应各知所应为之事”。内部构造尤应先行详慎规划，进出口应求其大，演讲厅数量、规模、环境应能满足实际所需，事务室、保存室、总务室、机房、储藏室等均应妥善设计安置，并保证各自的安全²⁴。谈福绥（生平不详）则从博物馆选址、性质、采光、各展览室的连接、各部门位置、扶梯、升降机、内部装饰等21个方面阐述了现代博物馆的设计要素²⁵。蒋大沂剖析了博物馆的“馆”，指出一个地方有一座好的博物馆是当地民众无上的幸福，这既需要馆舍内有为大众服务的“前台”，也需要有专业人员工作的“后台”；陈列室和仓库应注意防尘、防有害光线，陈列室应有充足光线、内部不宜太曲折；演讲厅、阅览室、陈列室应有减弱脚步声音的设备；全馆应备齐防火防盗设备；建筑装饰不应喧宾夺主，还要留出足够的拓展空间²⁶。他又指出，保存、研究、传播文物古迹，是所有博物馆的责任，所以举办者、经费拨付者要积极推动、支持博物馆及时搜集藏品²⁷。

关于自然博物馆的建设，曾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长的王念劬指出，博物馆应有山林广场，以供鸟兽之栖处、以备花木之树艺、以资农作实验之模范²⁸。关于科学博物馆，荆三林认为其藏品分类可依照三种标准分类，即用途性能、品质类属、所在地域；工作内容包括资料（物品）的搜集与制造、资料保管与研究、陈列、说明与演讲及标号、实验与说明；馆内可分设总务部、动物部、科学历史部、植物部、地质矿物部等；还要特别注意人才招揽、馆址确定、经费筹集、建筑设计、对外合作等²⁹。关于小学举办小型博物馆，孙志良认为其场所可先简后繁、从小到大；展品须由师生共同搜集；藏品整理与保管、引导参观、环境保护等工作应有专人负责³⁰。此外，王幼侨指出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范围，更宜以复兴民族为要图，利用馆内所藏器物，对民族历史作系统考证，探讨传统之事实，以此促进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道德、激励民族精神³¹。

博物馆对于学校教育是重要的补充，杨宽认为博物馆是学校的公共教室³²，应尽可能做到四“博”：藏物之“博”、搜集方法之“博”、业务之“博”、教育对象之“博”，如此才能成为现代的、活的博物馆³³。博物馆如果能时常举办特种展览会，不但可以使观众感到耳目一新而多次光顾，还会引发民众对某一领域的特殊兴趣，更能使学者得到充分的研究资料。对此，杨宽概述了上海市博物馆相继举办的中国建筑、苗黎风俗、古代玉器、唐瓷瓦窑、抗战文献等不同专题的展览会及其较好的社会效果³⁴，认为展览会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了博物馆的业务。

考古及博物馆学家佟柱臣指出，博物馆无论何时何地举办展览，均应考虑中国大众的消化能力，同时也要为专家提供所需的资料；为使博物馆在社会教育上发挥更大、更久的效力，可以实行免票制或象征性地收取最低票价；对于鄙远之区，宜用游动式展览，同时播放相关影片；博物馆内部应成立各专门研究室，定期出版刊物与报告；大馆对小馆、省馆对各县馆都应尽力扶持³⁵。曾任武昌文化图书馆专科学校教务主任、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兼图书馆博物馆学位系主任的图书馆学家汪长炳指出，博物

馆在建设之初必须明确四项原则，即“步调须与客观环境配合”“方针须与各项建设配合”“内容须与用者需要配合”“技术须与所负任务配合”，还要有与国家发展相符合的详细计划以及专门人才的积极参与等³⁶。曾任国立西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图书馆学家李永增认为一座现代博物馆应符合四个重要标准：丰富的收藏、科学地整理藏品、公开展览、适宜的建筑³⁷。

这一时期同样有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引介。李永增翻译的《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一文从基址面积、建筑样式、储藏室与售卖处、大厅、盥洗所、用具室、办公室、中心厅、饮食店、参考室、纪念品等 44 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建设理想、合用的博物馆建筑³⁸。图书馆学家黄元福翻译的《小型博物馆建筑与设备》从前期准备、设计原则、扩展计划、光线、天窗、防护功能、防火等多个角度分析了小型博物馆在建筑营造、设备安置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³⁹。曾任职于故宫博物院的赵儒珍的译作《现代博物馆之形式与功用》提倡通过设置无障碍房间、可移动墙壁、可调节人造或自然光，建设“可伸缩性的博物馆”；还提倡多建“四郊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可以是一个或多个中枢博物馆的分馆，两者分工不同又互相连接⁴⁰。

总之，博物馆作为教育的重要场所，如果选址不当、光线失宜、结构欠佳、设施缺漏、尺度失调，展品就不能得到完美呈现，教育功能也不能有效发挥。晚清民国时人也正是基于对国内外博物馆诸多的实地或文献考察与比较，日渐认识到博物馆场馆建设及其内部设施布置、藏品搜集研究利用的重要性，从而有了系列思考与探索。

四、对于博物馆经营管理的研究

在认识到博物馆的功用及其应具备良好的场所之后，还需要科学经营管理博物馆。缺乏科学、全面、有效的经营管理，同样不能持续有效发挥博物馆应有的功能，这是博物馆软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关系着博物馆的成败，因此也是晚清民国时人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博物馆的经营管理首先需要明确目标与自身定位，其次需要不断丰富馆藏和加强相关科学研究，同时还要通过各种渠道广开社会服务之门、与社会各领域展开广泛合作。天民（生平不详）在《教育杂志》的《学校博物馆之施設》中指出（小学）学校博物馆设置目的在于“实际教授上之要求”“处世常识之付与”“发明、发现、创作能力之练磨”“产业思想之养成”“乡土之理解”。他还阐述了学校博物馆陈列材料的选择与搜集，应围绕博物馆设置目的进行，需要广大教师的持续努力，积极联络公署、工厂、商店等，鼓励儿童将自有物品带到博物馆等；阐释了陈列方法也应多样、灵活，除了在日常教育中有效利用博物馆展览，“家族谈话会、毕业生会等也是促进利用的途径”⁴¹。曾任教于多所大学的吴家镇从意义、沿革、组织、内容与教学、种类、改进等多方面对教育博物馆作了综合研究。他指出，教育博物馆诞生于 1817 年的法国，此后，英、德、加等欧美诸国纷纷建立，数量达到了八十余座；教育博物馆的陈列内容多包括校舍、校具、教具等实物模型、照片，教育报告、教科书、教育品目录、校规，学生成绩品，教育史材料，实验仪器设备等；其性质是以学生为直接对象，以服务教学为主要目标；我国的教育馆有各县的通俗教育馆、二次全教大会之教育馆等，其立意更广，但应增设导览、表演人员，加强与学校、家庭、社会的联络，并通过演讲、表演、邀请观展、举办全体运动会等方式，以一馆所在实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齐丰收⁴²。

桑采莢（生平不详）从征集、陈列、研究三方面论述了博物馆完成社会教育使命的基础、途径与方式，指出博物馆内容的充实全在陈列品的丰富和精湛，需要社会的大力协助；馆内的陈列也需要参观者积极提供改良意见和建议；博物馆的研究同样需要学界的积极合作，实现“学术救国”，博物馆是重要的阵地⁴³。曾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的马宗荣系统分析了博物馆的意义与职能、起源与发展、博物馆种类、行政组织、博物馆的建立及其设施、博物馆的教化事业，指出世界博物馆在历史发展中，其社会化的因子有三：“卢浮宫为代表的大型皇室收藏对外开放、大学及各学校附设博物馆的勃兴并对民众开放、博物馆陈列方式的改善”。此外，他认为博物馆可依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诸如中央的、地方的，普通的、专门的，成人的、儿童的，公立的、私立的等；博物馆的行政组织可采用馆长制，下设学艺部、事务部，外设评议委员会；中国博物馆的建设首先要研究其整体布局，应在各省、市以及大专院校分设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各县设立乡土博物馆，名胜古迹设立户外博物馆，还应提倡兴建私立博物馆

⁴⁴。

程伯群不仅论述了博物馆事业与文化建设的重要关系，还认为博物馆可分为普通博物馆、参考博物馆、海洋博物馆、工业博物馆、农业博物馆等；博物馆的管理有国立、市立、私立之别；应用技术涵盖了绘图、标本采集、标本制造、品质鉴别等⁴⁵。陈邦杰阐述了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关于各类资料的搜集、研究、陈列、演讲、表演传播等工作内容，提出全国各城镇也应设立地方性科学博物馆⁴⁶。韩寿萱指出，应通过促进博物馆收藏合理化、阐发博物馆教育必要性、加强博物馆陈列意义化、形成博物馆人才专门化等途径，不断完善中国现有的博物馆⁴⁷。

五、结语

随着中国博物馆在晚清民国时期的产生与发展，张謇、蔡元培开启了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先河，费畊雨、费鸿年、陈端志、荆三林、曾昭燏、李济等建构了博物馆学科及专业领域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此同时，有更多的业内外人士如杨宽、王幼侨、胡焕庸、周盛德、吴家镇、李永增等，对博物馆的功能与作用、建设与管理、发展历史等作了见仁见智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由此使中国博物馆早期发展阶段的理论探索完整呈现。纵观这些研究，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紧密结合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一方面多角度阐释博物馆的实质内涵及其在开启民智、普及常识、促进教育事业、增进文化自识、复苏民族精神乃至振兴民族经济等方面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以博物馆发挥这些功能应有的基础与可用的途径为核心，详细探讨如何在借鉴欧美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现代化”博物馆的建设与经营管理。所以，这些研究不仅具有自身鲜明的时代烙印，而且也呈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博物馆自身的独特个性。由此可进一步言之，对这些研究的梳理，不单旨在尽可能厘清近代中国关于博物馆理论的所有贡献，更在于揭示博物馆文化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所具有的深切关联。

注释：

1[1]王幼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

2[2]王幼侨：《博物馆与民族复兴》，《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第2卷第1期。

3[3]郑师许：《论吾国急宜提倡博物馆事业》，《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9期。

4[4]祝嘉：《博物馆教育与新中国建设》，《教育与社会》1947年第6卷。

5[5]杨宽：《博物馆与市政建设》，《中央日报》1946年12月8日第10版。

6[6]杨宽：《论推展我国社会教育必须扩展博物馆事业》，《文物周刊》1948年第55期。

7[7]程伯群：《博物馆与文化建设》，《工读周刊》1935年第1卷第1期。

8[8]胡肇春：《现代化博物馆与学校合作问题初论》，《学术世界》1936年第1卷第12期。

9[9]蒋大沂：《博物馆与学术研究》，《中央日报》1946年10月13日。

10[10]a. 韩寿萱：《望社会认识现代的博物馆》，《独立时论》1948年第1集；b. 韩寿萱：《中国博物馆的展望》，《教育杂志》1947年第32卷第6期。

11[11]同[6]。

12[12]荆三林：《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学术世界》1936年第2卷第2期。

13[13]荆三林：《地方博物馆之目的与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第2卷第2期。

14[14]荆三林：《科学博物馆之功用及其组织问题》，《青年中国季刊》1941年第4期。

15[15]陈邦杰：《谈科学博物馆》，《青年与科学》1945年第2卷第3期。

16[16]a. 胡焕庸：《开发边疆与设立边疆博物馆之关系》，《边疆半月刊》1936年第1卷第5期；b. 胡焕庸：《设立边疆博物馆之需要》，《地理教育》1937年第2卷第3期。

17[17]阮光铭：《本局警察博物馆的意义及其任务》，《上海警察》1946年。

18[18]《安全博物馆的使命》，《工业安全》1935年，第29-34页。

19[19]胡肇春：《最有效的教育工具：现代化博物馆》，《广东教育》1946年第1册。

20[20]孙志良：《怎样经营小博物馆》，《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3年第4卷第26期。

21[21]Marion E. Miller 著、杨汝熊译：《博物馆与学校》，《山东民众教育月刊》1931年第2卷第4期。

22[22][日]吉野栖三著、陈至诚译：《地方博物馆网的建设和开发地方》，《复兴月刊》1935年第4卷第3期、1936年第4卷第5期。

23[23]《博物馆之光线问题》，《科学》1924年第9卷。

24[24]周盛德：《陈列馆建筑之研究》，《总商会月报》1925年第5卷第9、10期。

25[25]谈福绥：《现代博物馆设计概要》，《建筑月刊》1937年第4卷第10期。

26[26]蒋大沂：《博物馆的“馆”》，《中央日报》1946年10月23日。

27[27]蒋大沂：《办博物馆的算盘该怎么打》，《中央日报》1946年10月23日。

28[28]王念劬：《博物馆之透视》，《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第1期。

29[29]同[14]。

30[30]同[20]。

31[31]王幼侨：《博物馆应注重民族部及其研究之范围》，《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1-5页。

32[32]杨宽：《博物馆里也该有教师》，《中央日报》1946年10月20日。

-
- 33[33]杨宽：《博物馆该怎样“博”》，《中央日报》1946年10月27日。
- 34[34]杨宽：《博物馆与特种展览会》，《中央日报》1947年1月12日。
- 35[35]佟柱臣：《谈博物馆》，《凯旋》1948年第36期。
- 36[36]汪长炳：《今后图书馆博物馆教育事业的展望》，《教育与社会》1946年第5卷第1、2期。
- 37[37]李永增：《我也来谈谈博物馆》，《中央军校图书馆月报》1936年第28期。
- 38[38]B. I. Gilman 撰、李永增译：《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7年第2卷第4期。
- 39[39]Laurence Ysil Coleman 撰、黄元福：《小型博物馆建筑与设备》，《教育与社会》1944年第3卷。
- 40[40]Clarence S. Stein 著、赵儒珍译：《现代博物馆之形式与功用》，《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1936年第1卷第5期。
- 41[41]天民：《学校博物馆之施設》，《教育杂志》1917年第9卷第1期。
- 42[42]吴家镇：《教育博物馆与教育馆之研究》，《河南大学文学院季刊》1930年第2期。
- 43[43]桑采莢：《博物馆事业扩展的急要和社会协助的需要》，《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馆刊》1933年第1期。
- 44[44]马宗荣：《现今博物馆的设施与教育》，《教育与民众》1933年第4卷第8期。
- 45[45]同[7]。
- 46[46]同[15]。
- 47[47]同[10]b。